

# 《倒转“红轮”》 来自彼得大帝反对派

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故事起于彼得,也应当终于彼得。有意思的是,《倒转“红轮”》这本书在时间序列上,却倒着走,起于索尔仁尼琴,终于彼得。

这样的论题组织方式,可见作者匠心所在。作者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问题,给读者慢慢解答谜团。历史的线性时间,仍是这本思想史著作的纵向坐标,只不过,它是倒着陈列的。

□书评人 张晓波

## 谁是俄罗斯知识分子?

别尔嘉耶夫在《俄罗斯思想》一书中,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。他说,在俄罗斯,只有对政权不断进行批判的,才有资格称知识分子。他将俄罗斯第一个知识分子的荣誉,给了18世纪晚期的政治批评家拉吉舍夫。后者在《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》一书对沙皇治下农村的衰败,表示了强烈的愤懑。拉吉舍夫最终死在了流亡地。

俄罗斯知识界对同行下的定义,也为外部的评论者所认同。以赛亚·伯林独具个人写作魅力的《俄国思想家》对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描述,大致也不外乎此,别尔斯基尖锐犀利,赫尔岑宽厚深沉,民粹派彷徨无助,民意党人鲁莽灭裂,如此等等。但总的来说,他们在俄罗斯并不清晰的政治谱系上,有一个共识是能达成的:不与沙皇政权合作。

俄罗斯知识分子爱捣蛋。这种行为模式,当然与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方式有关,但更深刻的动因是什么?这是金雁《倒转

## 知识分子“往回看”

金雁选取分析的第一个俄罗斯知识分子,是索尔仁尼琴。索尔仁尼琴是个难以理解的人物。关键并不在于他反抗苏联,而在于他作为流亡者,同样对西方世界乃至叶利钦改革不满。

1974年,索尔仁尼琴流亡,同时《古拉格群岛》出版,名动天下,成为《时代》杂志封面人物,甚至整个西方将其表彰为自由斗士、苏联的掘墓人。对此,索尔仁尼琴的答复是什么呢?1978年,索尔仁尼琴受邀在哈佛大学毕业演讲,索氏语出惊人,他称西方文化“虚弱而堕落”,欧美民主并不是“普世价值”。看来,冷战另一极显然是误会了索尔仁尼琴的“投怀送抱”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索尔仁尼琴归国之后,对叶利钦推行的改革也大为不满,并且处处讲些政治不正确的话。对于苏联的“四分五裂”,他大为不满,抱怨现在“俄罗斯人”处处受欺负;对于俄国传统,他忧心忡忡,声称“俄罗斯人”忘记了身份、传统;对于东正教,则担心“外来宗教冲击”,甚至还出了本仅印行了5000册的完全不合时宜的政论集《倾塌的俄罗斯》。对此,有俄罗斯评论家不无讽刺地说,“索尔仁尼琴应该老老实实生活在

“红轮”——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》开篇指出问题。

金雁过去的著述,集中在欧东转轨、俄罗斯农村公社改革问题上,涉及知识分子议题的,是关于路标派问题的几篇论文,并不算多。从方法上来说,金雁之前的研究,偏重历史与社会学。所以,这本思想史的新著,注定带有很强的历史学风格。

这从金雁的提问方式上,就看出不一般。金雁在本书的开篇,就提了十几个问题,每一个问题的答案,似乎都难以在思想史的范畴中获得解答。当然,最有意思的,还是知识分子问题。中国关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论述很多,很多往往流于表面化的颂扬与批评,却始终难以理解为什么俄罗斯知识分子“走极端”。

看起来,俄罗斯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特点,并不是下定义,或者总结性格特征,就能讲清楚。这个一直为人忽视问题根源何在?金雁这本新书,提供了对此一问题的一种探索。

奥林匹斯之巔”,言外之意是索氏归国之后发表的一系列言论都是蠢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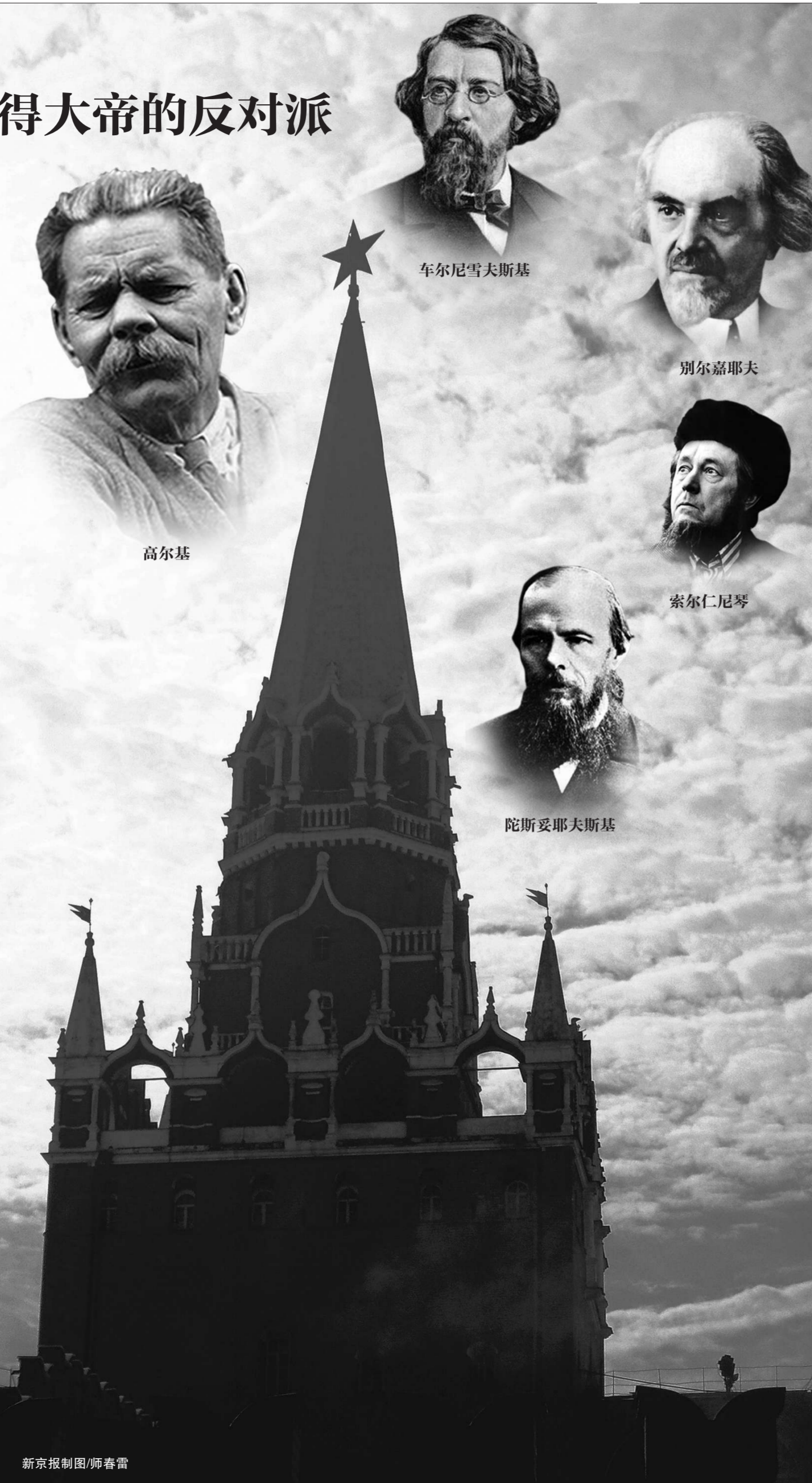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,索尔仁尼琴并非完全不可理解。索尔仁尼琴的后半生,他一直在写一本非小说、非历史的超大规模的鸿篇巨著《红轮》(全书二十集,超过一千万字)。“红轮”的意思,是指出1917年俄国大革命。

1917年俄国革命,并非只有一场,按照时间序列,可以分为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。苏联解体之后,批判的矛头,往往指向十月革命而肯定二月革命。不过,索尔仁尼琴与转轨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完全南辕北辙,他写“红轮”,要清算的,也包括二月革命。按照索尔仁尼琴的理解,整个的彼得大帝以来的俄罗斯传统,全部有问题。

在一个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的纪录片中,索尔仁尼琴絮絮叨叨,批判的矛头几乎指向所有现代的东西,从政治到生活,甚至城市规模,他都大发宏论,认为全都中了西方文明的毒,已经坏到无可救药了。

索尔仁尼琴“往回看”,就要有一个“理想国”,他要的,是彼得大帝(1672—1725)与尼康大牧首(1605—1681)之前的俄罗斯传统。

彼得大帝与尼康有什么错?



车尔尼雪夫斯基

别尔嘉耶夫

索尔仁尼琴

陀斯妥耶夫斯基

新京报制图/师春霞

## 彼得大帝的圣旨

非独索尔仁尼琴,彼得之后的俄罗斯知识界,都爱将问题引向他。彼得干了一桩重开新天地的大事。

彼得大帝发现,尽管俄罗斯地大物博,但他所继承的,不过是一张白纸。彼得在白纸上写了两个字:欧洲。圣旨传了下去,并被粗暴且强有力地执行了。

这个故事引发的最引人瞩目的辩论,来自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化界的西化派与斯拉夫之争。这场争论的范围,遍及俄罗斯社会的各个领域,胡子、服饰、语言文化、文学创作、首都乃至政治体制问题,两派都各有见解。

今天,这场东方与西方、激进与保守的争论,早就烟消云散了。留给世界读者最直观的印象,大概就是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纷争,两者不仅在文体上大为不同,更在小说中与交往中发生激烈舌战。

帝俄时代,文化生产受到高度控制。政治上的思考与辩论没有公开的生存空间,从而使得文艺作品中担负起了政治讨论与社会关怀的重任。正是这个原因,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家,都几乎在小说中唇枪舌剑,大讲政治、信仰、民生乃至国家前途问题。

奇怪的是,这些埋藏在小说中的核心辩论,都和彼得的政策有一定历史承续关系。十九世纪,是俄罗斯的启蒙时代,启蒙克复专制,文明胜于野蛮,进步战胜落后,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刊之论。广义上的斯拉夫派,是文章上的赢家(阿克萨科夫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属此阵营),却是政治与社会实践中的输家。十九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每一个进程,似乎都在按照彼得的方式推进。最终,催生了高度仿效欧洲先进政体、或者按照欧洲思想家设

## 难以驯服的异端

以强化皇权为核心的官僚体制改革,碰上的另一个问题是,如何强化国家对于宗教的管理。

东正教并不是俄罗斯的本土宗教。俄罗斯于1988年接受东正教为国教,1453年东正教大牧首所在地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攻克,东正教世界的中心,就转移到了莫斯科。随后,莫斯科提出了第三罗马论,“第一罗马已灭亡,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已为野蛮人攻灭,第三罗马莫斯科,将永远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中心”。这个教权中心的理论的提出,直接为俄罗斯的领土扩张提供了文化上的合法性论述。

但东正教世界中心的转移,并不能代表东正教世界的统一。俄罗斯东正教,混杂着地方化的多神教、因典籍翻译产生的礼仪不一,等等一系列问题,始终困扰东正教的统一。

尼康大牧首(1605—1681)强力推行正统派(三个手指画十字)的宗教改革,驱逐、流放旧礼仪派(两个手指画十字)。尼康更为野心勃勃的是,他不

计的1917年的两场革命。

对于彼得在圣旨上写“欧洲”两字,思想史争论中,对这位大帝的做法,大抵就是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。但彼得改革的故事,本身没那么简单。彼得迫使俄罗斯迈向近代资本主义,接受西欧式的服装、礼仪乃至文教语言体系。而这些措施中,最值得重视的,是彼得通过官僚化手段。彼得之前,俄罗斯土地贵族,同时也是政治世家,经过彼得改革之后,官僚由中央选派指定,土地贵族的进身之阶,就只有依附于皇权,失去了原本的政治力量。

国家机器官僚化,这是彼得政治改革中最为核心的部分。皇权主导改革,通过现代化的官僚政治系统,进一步强化皇权。

“封建”一词的原初意义,是贵族制下“封土建国”,欧洲列国漫长的封建史,大多符合这一定义。在这个意义上,沙皇彼得也在反封建,并且要用资本主义手段来驯服封建土地贵族。和整个欧洲现代的轨迹一致,俄罗斯帝国的形成,也经历了三个形态,从邦国(基辅罗斯时代零散的斯拉夫公国)到(土地贵族与君主联合执政时代),最终,彼得完成了第三步,把邦国变成了帝国(独裁君主制下的多民族国家)。

彼得改革的第一个伏笔,是皇权固然得到加强,却得罪了土地贵族。贵族知识分子的来源,也就并非没有缘由。在整个十九世纪与沙皇政权进行政治对抗中,充当急先锋的,就是出自贵族的知识分子。社会身份背景与思想行动,并不能简单画等号,但彼得及历任沙皇加强皇权的集权改革中,却塑造并培养出了皇权的对立面——贵族反对派。

既要统一东正教,还要将教权置于皇权之上。而沙皇阿列克谢在1666年尼康改革成功之际,就流放了尼康,将教权置于皇权之下。彼得更进一步,设立宗教事务管理局,将东正教用行政手段加以管理。彼得用“恺撒主义”,将教权与皇权合一,用绝对君主制一揽子解决了俄罗斯帝国的治理问题。

但问题是,异端仍然存在,不是一个两个,而是千万人。正统派称这批异端为分裂派教徒,分裂派教徒在俄罗斯历史上,长期被边缘化,于是,他们也成为反沙皇的急先锋。金雁在本书第二章中,举证了分裂派教徒资助布尔什维克的历史。

1994年,流亡海外二十年的索尔仁尼琴高调回国,其中一个重要的活动,是去祭奠分裂派受难圣徒阿瓦库姆。索尔仁尼琴不是分裂派教徒,他重视的,应是分裂派教徒不懈抗争的精神之力。尼康之后的两百余年,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,分裂派教徒始终在给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反叛提供资助。

## 「精读」俄罗斯的“不解之问”

我一直尝试用长时段“立体”的“叙事方式”去“解读”俄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。我并不力求建立什么“范式”,只是希望对俄国各种知识群体有一种“长焦距”的“历史透视”,厘清表现在显性层面背后的线索。

一

我对俄国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感觉由来已久,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多少都有点“苏联文学控”,那个时候痴迷俄罗斯作品几乎是一代人共同的经验。除了时代背景提供以外,俄语的普及和翻译曾出现过一个语种都没有的“全民热”也是一个主要原因。

我因为上学早一些,所以爱好趋向都是向上靠,愿意和年龄比我高的高中生“混”在一起,热衷于追逐他们谈论的话题,所以小学后期和文革中间阅读了大量的苏俄文学作品。但是毕竟因为理解有限,那时候我喜欢苏俄文学主要喜欢有曲折故事情节的,基本上锁定在反特、侦探、战争、爱情文学之类的著作,以能在同龄孩子中讲故事的“臭显摆”作为动力。那时候看书遇到时代背景、遇到深层思索的东西都跳过去不看,也记不住那些绕口的俄语人名和地名,尤其不喜欢所谓“黄金时代”那些代表性人物的东西。再比如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太晦涩,太阴暗、太极致,太疯癫怪诞,感觉文字背后还有读不透的东西,老有在“地下室”的迷宫里穿行的感觉,压抑的人透不过气来,以我当时的年龄实在感到大惑不解。在我看来这些大部头都可以缩写成小册子,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干过把某些小说的结尾撕掉,自己用作业本重写一个我认为满意的结局,而用浆糊贴上去的狗尾续貂的傻事。

有一个阶段我突然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很着迷,把当时能搜罗到的他的作品逐一阅读。从晚上自习时开始阅读,宿舍11点熄灯以后,就打着电筒顶着被子继续阅读,电筒的电池耗光以后,又燃起蜡烛,整个一个感动得稀里哗啦,泪水止不住地流,为了不使抽泣声影响到其他人,我用毛巾堵着嘴,到了清晨我两个眼睛肿得成了一条缝,怀抱着书久久不愿撒手还给别人。读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《怎么办》以后就和同学约定比赛,看谁更能吃苦,看谁更有毅力,看谁更能抗得住心理打击,看谁更能在逆境中成长。再往后又对国内内部出版社印的“黄皮书”趋之若鹜,《叶尔绍夫兄弟》、《热血》、《你到底要什么?》、《普隆恰托夫经理》、《州委书记》成为我们俄语班几个女生热议的话题。可以说,那个年代如果没有这些作品的相伴,我的人生该是孤寂和无趣。

二

因工作关系,我的研究曾先后“分叉”到东欧现状、苏共历史问题当中,记得1982年初我刚到陕西师大苏联历史研究室的时候,我就对杨存堂老师说,“你们大家做‘桌面’搞苏联史研究,我当‘桌子腿’继续我的俄国中古和近代史研究”,这个愿望没有获得支持,我只好“转战”到现代史领域。现在想来,想“当桌子腿”这话一晃30年过去了,总算可以还一还历史“旧账”了。

很早我就注意到俄国史研究中的一些不合常规的奇怪之处,于是我自己总结了俄国史中的几大怪:第一怪,农奴的身份很难猜;第二怪,地主、军人分不开;第三怪,农民比沙皇当父亲来看待;第四怪,知识分子天生爱捣蛋;第五怪,少一手指口的俄语人名和地名,尤其不喜欢所谓“黄金时代”那些代表性人物的东西。再比如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太晦涩,太阴暗、太极致,太疯癫怪诞,感觉文字背后还有读不透的东西,老有在“地下室”的迷宫里穿行的感觉,压抑的人透不过气来,以我当时的年龄实在感到大惑不解。在我看来这些大部头都可以缩写成小册子,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干过把某些小说的结尾撕掉,自己用作业本重写一个我认为满意的结局,而用浆糊贴上去的狗尾续貂的傻事。

这种“不解之问”还有多很多很多,如果照此罗列下去,恐怕几张纸都写不下。如碰到这样的问题,我的学生都借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,俄罗斯是矛盾的、用理性无法解释的,似乎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无解的“斯芬克思之谜”,而不去解其中之“味”。

破解俄国知识分子的“斯芬克思之谜”,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愿望,这些年断断续续地一直在做积累工作。其实现在拿出来的《倒转“红轮”》在我看来,仍是一个思想过程的“半成品”。

我决心近期内把电脑里的东西整理出来,《倒转“红轮”——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》是第一本,第二本暂定名叫《历史的化装舞会——俄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变迁》,第三本《从人民之子到人民之父》是讲民粹派的。我已经想好了,再不铺新的摊子了,要是能把这几本书都完成了,我就退休之后开始写“闲书”,讲好玩的故事。

选摘自《倒转“红轮”》自序,文章有删节



《倒转“红轮”》作者:金雁 著 版本: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9月版 定价:68.00